编者按:一纸发黄的手稿,引出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48年前的一段旧事。旧事重提,给我们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对往事的回忆,更多的是对今天的沉思。历史是最耐咀嚼的,隔了48年的曲折路回头看,有些东西会更加清晰;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沉淀,有些问题会不言自明。我们在对历史的沉思中洞见未来,这个美好的未来属于冯先生和他小小的前洲镇,更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国家。

重读《回乡见闻》书感

冯其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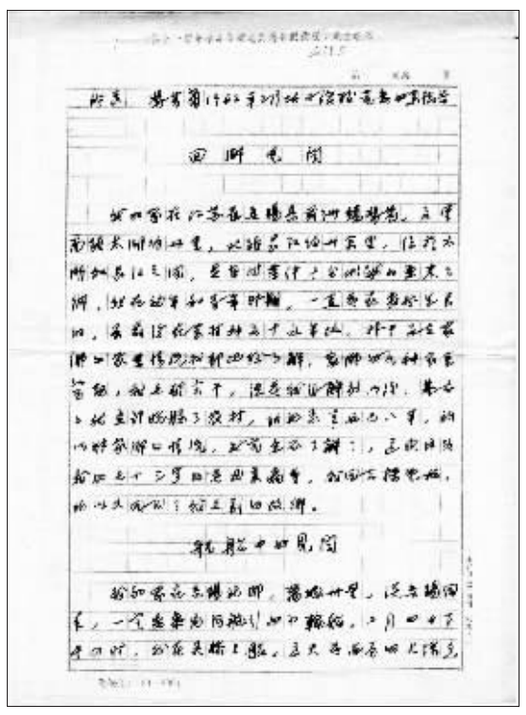
冯其庸先生在书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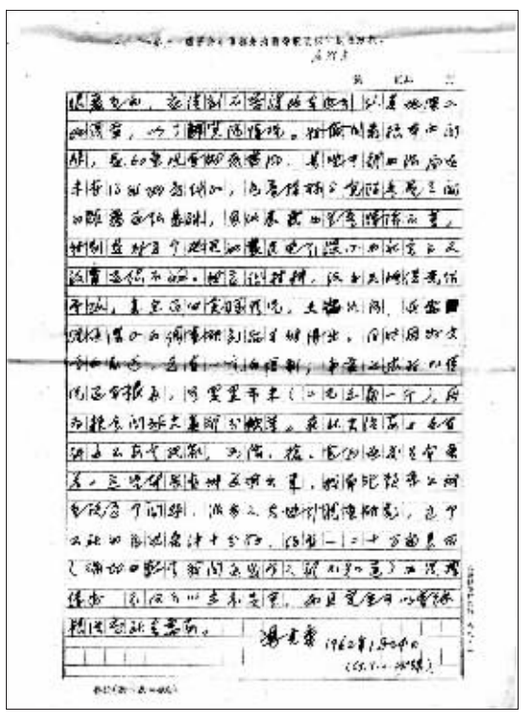
《回乡见闻》,是我1962年2月24日向人民大学党委会写的一份报告,因为我在回乡之前,学校开党员大会,组织上通知,党员回家或外出(因正值放寒假),回来一定要向组织汇报见到的当地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农村。因为这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

我是因母亲病重才回去的,我于2月3日离开北京,2月4日到无锡。随即坐船回无锡县前洲镇冯巷农村老家。这篇文章就是真实地记录了我当时所见到的农村的情况,真是见到了我从未见到过的一片凄惨景象,饿死人的景象。

我的报告交到党委会后,就得到了人大党委会的表扬,说报告写得很好,说我敢于说真话。后来人大党委又把这篇报告报到了北京市委,北京市委也同样表扬了我,之后这件事就过去了。我当时交的是一份底稿,并没有再誊写一份。因为我写文章习惯是只写一稿,我的底稿交上去了,我手里也就没有这篇文章了(那时还都是手写,没有打字机)。没有想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们却想到了这篇文章,他们去把这篇文章找了出来,同时宣布我这篇文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要我接受批判,向党和群众认罪。

当时我手里虽然没有这篇文章,但文章是我写的,我脑子里根本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文章里哪里会有这样的思想。所以我坚决不认罪、不做检查。我就向军宣队提出要求,我说要我检讨、认罪,总得让我看到文章吧,事隔多年,我早已忘记了,不看文章,我怎么能检查呢?军宣队就把文章找来交给了我,我重新读了这篇文章,心里就更加有底了,分明是他们强加给我的"罪名"。这文章里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农村饿死人的情况是事实,但丝毫也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编造也编造不出来。所以我就向造反派们提出要求:一、这篇文章既然是反映我家乡情况的,就应该到我家乡去核实,看我是否是说的真话,还是编造谣言攻击社会主义;二、我愿意跟着你们一起到我家乡去,将文章念给我家乡的老百姓听,由他们去发动广大群众来批判我,我愿意面对群众。这两点要求我也向军宣队提了出来。结果造反派们没有一个肯跟我一起到我老家去的,军宣队读了这篇文章,也不同意造反派们对这篇文章的定性,也认为这篇文章并没有那些问题,终于一场气势汹汹的对我的批斗,就算不了了之。我则因为这场对我未遂的批斗,反而得到了这篇我早已忘却了的文章。现在虽然已经事隔47年,我重读这篇文章还是有启示的。最重要的启示,是我在文章里说:





1962年冯其庸先生《回乡见闻》手稿

这个公社(指我的家乡)自然条件十分好,约有一二十万亩良田(确切的数字我问过几个人,都不知道),工作搞得好,不仅可以丰衣足食,而且完全可以有余粮供应社会需要。

我47年前的这段预言,已经完全被事实证明了,不仅是证明了,而且我的家乡已经经历了几番的经济飞跃了。今年3月,我回家去了一趟,我实在已经不认识我的家乡了。

我的家乡,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起到70年代,为了挖除"穷"根,就大力治水,根除水患,当时上面提出的口号是"农业学大寨",但我的家乡是低洼地,年年闹的是水害,是农田被淹没,而不是大寨一样的山区。所以当地的干部就从实际出发,进行治水,经过连续10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水患得到了彻底根除,所有的土地,都变成旱涝保收的良田,从此家乡就永远告别了饥饿,也就开始站起来了。在治水过程中,又带动了小工业,镇上办起了小工厂,走上了农副业、工业综合发展的道路。而且路愈走愈宽,到1983年,我的家乡前洲镇成为全国首批亿元乡之一。1986年起,经济总量连续数年位居全国乡镇榜首。1991年获中国最佳乡镇殊荣,近几年来又先后被评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国家卫生镇和江苏省新农村建设示范镇。

我的老家是乡镇工业的发祥地之一。现有民营企业千余家,工商个体户2000多个。2008年,前洲镇国内生产总值40.2亿元,是1978年的400倍;全社会销售收入130.6亿元,是1978年的435倍;上缴国家税收4.6亿元,是1978年的180倍;人均收入12680元,是1978年的90倍。李先念、李鹏、李瑞环、乔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亲临前洲镇视察,高度肯定了家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建设。

现在,家乡物阜民丰,昔日旧貌荡然无存。我回到老家,再也找不到我童年到青年时期的一点痕迹,我要找我当年放羊的荒坟堆,要找我屋后常常钓鱼的小河,还有那两座连接在一起成⊥形的"一步两顶桥",尤其是那条我每天上学要走的弯弯曲曲的小路,和路右边形如葫芦的小河"葫芦头沟",这一切都已变成整齐的房舍和欣欣向荣的田畴了,留在我心头的记忆,早已找不到半丝痕迹了。我这个故乡人反倒变成了外乡人了。唯一还能找到的是原离我的老家约有一里半路的猛将庙里的那棵参天古树——古银杏树,还依然耸立着,算是让我找到了一个坐标。我可以依此来辨认我当年放羊割草的荒坟堆的位置,可以认出我原来居住的老屋的位置。它可以渐渐地把我带入回忆的梦乡。

今天的无锡农村

我问我的家人,他们说我的家乡包括整个无锡市,近数十年来,官吏没有贪污的事,没有刑事案件也没有民事纠纷,更从来没有老百姓上访的事,相反遇到公益的事,都争着出力出钱。他们说,连我的老镇——前洲镇的房子都拆除重建了两次,所以我再也找不到旧时的一点记忆的痕迹了。

我想着想着,我似乎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看到了一个实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我的家乡,只是整个中国的一小块地方,但是我却看到了我亲爱的祖国的前景,我希望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过这样的生活。

尽管还有许多困难,还需要更大的艰苦奋斗,但是我坚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实在的,有强大的旺盛的生命力的。它已经放射出迷人的光彩了,它的前景将是更加美妙的、现实的。

2009年9月2日于京华瓜饭楼

回乡见闻

我的家在江苏省无锡县前洲镇冯巷,这里南距太湖约30里,北距长江约30余里,位于太湖和长江之间,是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的鱼米之乡,我在幼年和青年时期,一直是在农村生长的,虽前后在农村种过10多年地,对于过去家乡的农业情况我都比较了解,家乡的各种农业劳动,我还都会干,但是我自解放以后,基本上就全部脱离了农村,到北京来也已8年,所以对家乡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了,这次因为我的73岁的老母亲病重,我回去探望她,所以又回到了我久别的故乡。

1942年高中一年级时在老家门口

冯其庸先生的母亲

航船中的见闻

我的家在无锡北部,离城30里,从无锡回来,一定要乘内河航行的小轮船,2月4日下午4时,我在吴桥上船,这天是旧历的除夕,乘船的人很拥挤,有少数是从外地回乡的,多数则是前洲镇附近的居民因事上城后回家的。我在船中找到了座位后,就注意倾听船中乘客们的议论。这时,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农和一位看上去有六十左右的老太太,开始在谈论了。老农自言自语说:"唉!想不到活到70多岁还要准备饿死。"这时在他身旁的老太太就接口说:"不会的,你的福气好,你的孩子在外面赚钱。"以下便是他们的对话:

老太太:"棺材总准备好了罢?"

老农:"这件东西倒是早已准备好了。"

老太太:"倒是现在的口粮问题,一个月吃13斤半,命都要炼掉了。"

老太太:"听说塘西那里很好(按:据说塘西在杭州那边,但我不熟悉,也不知是否是这两个字),粮食尽吃,怪不道人家把女儿送到塘西去换米。听说××家要卖家具,不知有没有人要?"

老农:"不知有没有台子(即桌子),如果有,我倒想弄一张,给小的儿子准备准备,宁可卖掉别的东西。"

老农:"我的儿子有一双长统胶鞋,那东西真好,现在买不到了。如有人要,想拿去换点米再说。"

老太太:"某某家一件新的卫生衫换了×斤米……"

老太太:"可怜×××,想不到扒了(意即"苦干了")几十年,会死在这个时候,弄得棺材都没有,丢下了一大群儿女。"

老农:"×××真扒,起早起,磨黄昏,从没有停过,所以人是空的。(意即人生是空的)。"

老农:"哪晓得现在比东洋人还狠(东洋人即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我们家乡沦陷时叫日本军"东洋人"),东洋人只要完(交)多少粮,哪听说现在要完(交)这些粮的,全部拿去了老百姓还有什么吃的。"

这时旁边有人插嘴说:"全部拿去了还不够,都把指标订得那么高,鸟还在天上飞呢(意即完全实现不了的)。"

这时,船中的一位中年男子向我招呼说:"你不是其庸吗?多年不见了。"(我已记不起这人的名字,只得含糊答应)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培均,是在蒋家弄边上开生面店的。"(这时我想起了他过去的样子)他说:"这次回家,你可能要不认得家乡了,乡间实在苦透了。"

以上,是我在船中所见所闻的实录,当时说的还要多些,但有些已经记不住了,这两位老农据了解是前洲镇东头拓塘滨人,据我观察,这两个人的生活恐怕还不是最苦的,他们的衣服穿得还算整齐(补得不很多),脸色虽然也憔悴,但说话时精神还好,不过多一些叹息声而已。重要的是他们在谈论时,周围群众的情绪都是与他们一致的,同时船中别的乘客也在议论,我只是记述坐在我对面的两个人的谈话。

"六十条"

我为了要了解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所以到家后,在与村中的农民接触时,就向他们询问"六十条"的贯彻情况,我问过好多人,如村西第一家的季芳(这家原来是较富裕的,抗战时,我在家乡种地,家中没有粮食,他们经济比较好,有余粮,养好几头猪),我家东邻的寿康,以及离我家五六里路的我的小舅父顾晓初等,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季芳说:"'70'条也没有用,都在干部手里。"寿康说:"'六十条'贯彻是贯彻了,就是没有认真照着做(贯彻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已经讲过了),开会时大家也不认真听,到会的人也不多。"季芳说:"我反正不去开会,这些会开了毫无用处,还去开什么会呢?"我问到退赔的情况,他们说:"整风整社开始时,好像很认真,只管来登记,但是,只有登记,没有赔偿,就是稍有赔偿,也是微乎其微,主要是记账的办法,或者说明年赔,或者说由小队赔,到现在是早已无影无踪了。"我家的前面有一间屋子,是被小队占为仓库的。据我嫂嫂说,从未付过租金或其他代价(占用已有一年多),仅在我回去以前几天,因为家中无柴烧,向小队再三说了,才算拿了3担稻草,我说为什么不提意见,他们说,提来提去总是如此,再提反而不好。反正翻来覆去总是这些人当干部。我说"六十条"规定得很具体,为什么不照"六十条"提意见,他们说"六十条"不在我们手里,我们也记不清是哪些。他们说,总之,共产党毛主席是好的,政府也是好的,就是干部不好,没有人了解我们农村情况。他们说你只要想想,为什么干部养的猪会长大,农民养的猪会死,因为农民得不到粮食,只有干部能弄得到猪食。

他们说现在农村中有三种人好过,第一是干部,第二是有钱的人(指在城里经商),第三是会偷的,所以现在农村中偷风很盛。他们说,你到街上去看看,脸上肥的就是干部,瘦的就是农民,大致十不离九。

访问所见

我们一个村子一共45家农民,我家住在村中心,村是面南背北,东西横贯的,我曾抽空在全村走了一转,同时访问了6家。自村东第一家数起,到我家为止,与我母亲同辈的老年人都死去了,仅存我母亲一人(其中我叫得出名字的一共有8人)。这些老人的死,有些是自然规律,有一些也是由于长期的生活困苦所致。据邻居们告诉我(乡间的医生也告诉我)乡下很多老人,都是"无疾而终"。什么叫"无疾而终"呢?他们说就是"油干灯草尽"。乡间常有这种现象,晚上还与别人在谈话,天明不见起来了,一看已经死在床上,他们把这叫做"无疾而终"。

我访问前村4家时,冯本泉、冯有泉两家是兄弟,本泉的儿子都在上海橡胶厂工作,他们都是我小学的同学,他们家经济是全村最好的,所以进去时,他母亲在家,没有谈到什么问题,有泉家略差些,但也还可以,也没有说什么问题,但情绪显然比本泉家要差些。

走到"大嫂嫂"(村中人都这样叫她,人们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家,她的眼睛已经半瞎,伛偻着身子坐在太阳光下,听说我去看她,她感叹地说:"三男(我的小名),你回来了,你幸亏出去了,在家里过不下去的,例如这个粮食不够吃,饿也要饿死的。"她就说了这几句话,看她的面容真是枯槁透了。我还到后边冯兆泉家,冯兆泉(约60岁)正躺在大门口太阳光下的一张旧躺椅里,身上盖着一片旧麻袋,满脸的胡子,瘦得已毫无生气了。我说兆泉叔,我来看你了,他说你倒还来看看我,我已不行了。他的下身围着一条破麻袋,说时气愤得很,他说我这样情况还毫无照顾。我告诉他只要生产不断提高了,会好转的,下次回来我再来看你,他说下次回来你看不到我了。

我在访问这些家时,完全没有想去做调查研究,因为我们村子很小,这些人家,都是过去很熟的,难得回家,理应问候他们一番,但不意却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景象,特别是无例外地那种十分消极颓丧的情绪,使我感到问题十分严重。

医院见闻

我到家是阴历的除夕晚上,到半夜里,我母亲又突然病发,到第二天上午,愈加沉重,请医生来诊断后,决定要送公社医院,午饭后即抬到医院里,因此我又在医院里听到一些情况,我母亲的病是肠子痉挛扭曲在一起,发剧痛,我坐在医院里半天,医生告诉我在大约3小时内,诊断了一个同样是肠胃剧痛的人。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民平时吃得很差,过年时吃了一些饭或其他东西,因此肠胃受不了,发生剧痛。后来据我小舅父顾晓初讲,在浮舟村上,就有一个农民因为一下吃得太多而胀死的。

在医院里,还看到许多患蛔虫病的人,农民管他叫蛔钻苦胆。据医生说,现在乡间是十人九蛔虫,因此杀蛔虫药都买不到。我母亲在医院住了两天,回到家里,忽然嘴里吐出来两条筷子长的蛔虫,因此使我想起她的肠子痛恐怕也是蛔虫,即赶到无锡在亲戚家弄到了一瓶派哔嗪服后,一下大便出来了29条蛔虫,而我母亲的病情也就顿时稳定。

"要还苏联的债"

粮食为什么会这样紧,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困苦,这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听到正确的答案,最流行的答案是"因为要还苏联的债",这是我亲自听到大队长说的,农民中间也有这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说,因为没有肥料,所以产量始终达不到包产的指标,包产指标是520斤,但实际产量是320斤,所以年年赔产。

第三种说法是集体种田是终归弄不好的。这种说法我只听见一个人说,没有听过别人同样说过。

在许多种解释中,没有一个人提出坚决贯彻"六十条"的要求,可见这些农民对"六十条"还不了解。

脱衣换米

我在航船中听到有脱衣换米,甚至把女儿送出去换米的现象,但不了解实际情况如何,但到了村上也就清楚了。下面我记述我的左邻冯寿康换米的经过。他说:"粮食不够吃,实在饿得难受了,总不能饿死在家,所以只有想法弄点米来吃了。我用一条单被、一件衬绒旗袍(这是他已死的妻子的)到奔牛去换了13斤米。换米真是苦,从家里跑10里路到洛社车站乘车,到奔牛下车后要在站上等天亮,然后到奔牛乡下农村中一家家去问,要不要换,等换到后赶到车站,如果赶不上车就只好再在车站等过夜,回到洛社后,夜里还不敢走,怕被别人抢去——据说这种事常发生,又要在车站上等着,天亮了才敢走,弄得不好,还要被奔牛人拦住没收,因为奔牛公社不准外地人去换米,派了人在沿路拦截。现在他说换来的13斤米又吃完了,又只能想法去换了。

以上是冯寿康自述的换米经过,至于将女儿送到塘西去换米,我虽听过好多人说,但未遇到亲自送女换米的人。

关键问题

上面这些都是我几天中的见闻,这都是农村的现象,这些现象只能说明一方面的问题,其积极方面的情况,也许公社已有措施,因为我来去匆匆,没有了解,所以也无法反映。但根据这些还未消除的现象来看,我觉得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刻不容缓地去进行认真深入的调查,以了解实际情况。我感到最根本的问题,是"六十条"没有彻底贯彻,某些干部的作风还未有得到彻底纠正,包产指标与实际产量之间的距离还很悬殊,因此农民的生产情绪不高,特别是对这个地区的农民进行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还很不够。我这份材料,仅仅只能供党做参考,其全面的实际情况,无论如何,还需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才能得出。同时因为文字的表达,总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农村的情况还有很多,如买黑市米(2元3角1斤),因为粮食问题夫妻分炊等。在社会治安上也有许多不安定现象,如偷、抢,甚至还发生命案等。这些都没有能反映出来。我希望领导上能重视这个问题,派专人去进行调查研究,这个公社的自然条件十分好,约有一二十万亩良田(确切的数字我问过几个人都不知道),工作搞得好,不仅可以丰衣足食,而且完全可以有余粮供应社会需要。

冯其庸

1962年2月24日

相关链接

"六十条"是1961年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简称。1958年的"大跃进"和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困难。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党中央决心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1年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会议,出台此条例,全文共60条,因此简称《农业六十条》。从此,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期。